

# 理论的降解与泛文论化的趋势\*

黄卓越

---

**【摘要】**“理论”的兴起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与“学科”设立有密切的关系，由此而替代哲学并成为主导此后知识探索方向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型。本文通过细致的梳理将之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理论第一期与理论第二期。并在此背景下考察了作为分科性的“文论”的成长与盛衰过程，以为在作为总域性的理论降解之后或“理论之后”，出现的是一种“泛文论”的趋势，又大致上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治学类型。借助以上的描述，作者冀望能对更为广泛的国际性知识潮流有一规则性的把握，进而对当今的学术研究有所启迪。

**【关键词】** 理论 文论 文化理论 泛文论

**【作者】** 黄卓越（1957—），男，浙江临安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汉学研究所所长，“BLCU 国际人文讲坛”主持人。香港《亚太语文教育学报》国际咨询委员、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文化研究、海外汉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602 (2019) 05-0164-15

---

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涉及两个有所不同的概念区域，即“理论”与“文论”，而最终的落脚点是文论，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文学理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理论”或“理论一般”的探查是次属的、不太重要的，这也是因为，无论何种分科化的理论会有怎样的独特性，都是在一种更大的“理论”氛围中形成与运演的。以此而论，对作为总域的“理论”所具特征与发展趋势等的一个完整把握，也将有助于我们对作为分域的“文论”表现出来的种种迹象等有更深的理解。

在这一论述框架中，随后要涉及的另一关键性概念是“降解”，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degradation”，原属生物学中的语汇，有“退化”与“降级”的意思。在此使用之也意味着，我们会将所有的知识或思想范型均视为一种具有更替性机能的有机体。尽管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我们已很习惯于将“理论”（或文论）这一术语置于喙边，然而从其“生长”过程上看，无论是将之视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治学范型，则无论中外，均非一种常态性的呈现物，而是与现代知识学的潮流相伴而生，并带有一

---

\* 本文原为2018年11月29日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所做同名讲座的一个演讲稿，有所增补、去口语化，并添加脚注后遂形成目前的文本。

自身盛衰的节奏，因此，也需将之置于更为悠长的历史条脉中，并通过与其他范型的比较来考察其来世今生的不凡命运。

## 一、“理论”：从学科的兴起到“理论之后”

曾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称做“科学之上是哲学，哲学之上是神学”。这种逐渐往上的层阶，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从抽象性的角度来判定的，认为越是抽象（或越是玄妙，越具有精神性），其所占据的阶位就越高。但是，如果我们是从近现代知识学的展开历程，并依据时序的排列来看，这个配置可能恰好是颠倒过来的，也就是越往后，抽象性就越是递降。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可以换一句话来描述三者的关系，变成了：宗教之后是哲学、哲学之后是科学。

这里涉及的“科学”这一概念，涵盖了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等几个大的部分，或据李凯尔特特的划分，可归纳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部分。<sup>[1]</sup>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科学”之意含，既指愈趋精密化的实证主义研究（以历史科学为代表），也指以系统化演绎方式建立起来的多种现代学科模式。对之，也可参照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发布的那篇著名演讲“Wissenschaft als beruf”（“科学作为天职”）及其前后发表的论文结集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的论述，在韦伯那里，“科学”一词同样是在此宽泛或统合的意义上使用的。<sup>[2]</sup>尽管，如果做一些词语上的分辨，还不能将“科学”（science, Wissenschaft）、“学科”（discipline）与“理论”（theory）这三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sup>[3]</sup>但是也有较为明显的贯通点以及共同的成长背景，有基于此，韦伯的上述二种著述在谈论知识史（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变迁时也很自然地是将三者置于一并表述的。<sup>[4]</sup>撇开一些细微的差异以及英、德等语言在指意上存在的出入，诚如我们所知，除了以实证见长的史学研究之外，几乎所有现代新“学科”（也可称为科学各门类）均是在“科学”的名义下，并以某些“理论”构想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为此也会在其中含有一套内在的概念体系，概而论之，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现代社会与人文学科的成长与建制过程都是与某种“理论化模式”的构设与扩展同步的。也正因此，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找到一种清空理论（框架、要素、概念）之后仍然可以确立并言述的“学科”或人文与社会“科学”，恰恰相反，后者的展开都依赖于理论（框架）的发明及为之而输入的动

[1] Von Heinrich Richert, *Kulturwissenschaft und Naturwissenschaft*, Tübingen: Verlag von J. C.B. Mohr, 1921.

[2] 参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München /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919. 而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则为 1903—1917 年期间发表的三篇论文合集。韦伯所述的“Wissenschaft”一语，中文学界有不同的翻译。如冯克利译为“学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李猛译为“科学”（《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版）。“Wissenschaftslehre”，韩水法等译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各家在有关这一概念的解释中，也都偏向于认为，以上几种译法大体上是相通的。另李猛也在同书“编者说明”中提到，从韦伯的意义上理解，过去曾有的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等，之所以在新的时代遭遇重大的变故，不是因为它们不是“科学”，而恰恰是因为它们也被转变为了“科学”。见氏书页 VII。其中或包含有旧名与新名、旧义与新义间的冲突，在此不究。

[3] 甚至于英语“science”与德语“Wissenschaft”也不完全同义，“science”源于拉丁语“scinetia”，有“区分”等的含义，参冯克利中译韦伯《学术与政治》，第 50 页译者注。借此也可推断“science”其实与分科之“学科”有关。但在英语的处理上看，可能因很难找到完全的对词，因而也一般会“Wissenschaft”翻译为“science”，如我们所见，Edward A. Shils 与 Henry A. Finch 将韦伯的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一书译为 *Max Weber on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ree Press, 1949)，便是十分分明的一例。

[4] 最显著的即其对“理想—典型”模态的表述，他如韦伯所述：“科学的思想图景是通过人为抽象建立的一个彼岸王国，这一抽象凭着自己瘦骨嶙峋的双手，其他把握血肉饱满的真实生活……”等等，《科学作为天职》，第 22 页。

力, 尽管其间仍有理论成分上的强弱之分。在这种情况下, 凡是理论的, 也都被公然或隐晦地视为是科学的, 都包含有对“真理”阐发的目的,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是这样认为的。<sup>[5]</sup> 既然如此, 我们既可以从学科的角度, 也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来观察“哲学之后”所发生的大规模的模式迁徙。<sup>[6]</sup>

有关西方知识史 (intellectual History)<sup>[7]</sup> 的这一进程, 需要在此稍做一概约性的梳理, 以便顺利地导入正题。我们知道, 古代希腊是人类思想的一个“早产儿”, 同时也可看作是被后来的欧洲人建构起来的一个西方思想之源, 此姑不论。在更为普遍的范围内, 人们遭遇的是一个漫长的神学或宗教的时代, 这是一种具有统一化意志的观念形态, 并以一至高无上的“神”或终极本体为论述的起点, 由此构成一套想象性的知识体系。文艺复兴之后, 世俗化知识替代神学 (从内部与外部), 成为探索世界的重心, 但“本体论”的冲动依然未变, 即仍然试图从一种“元语言” (meta-language) 的基点上来统摄与解释全部的世界景象, 由此而引发了哲学的兴盛并迎来了一个“哲学的时代”。这一转折大约至 18 世纪后期与 19 世纪初趋于鼎盛,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黑格尔、康德等庞大体系的建立, 尤以康德对“现象界“与”实体界“的划分为标志, 在将“上帝的归于上帝, 凯撒的归于凯撒”之后, 不仅促使哲学从神学中驳离出来, 也造成了哲学对宗教的僭位, 对“真理”的追求替代了对“上帝”的发现。以是, 哲学既成了一种“祛魅”的手段, 也借势登上了知识体系中无冕之王的宝座。既然本体论是带有普摄性效应的, 那么, 哲学也被看作对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然而, 哲学秉有的勃勃雄心从一开始即遭到怀疑论的抵制, 而至 19 世纪中后期, 情况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动, 仍然以人文与社会科学为例, 新的研究路径随着社会学、人类学、财富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等的陆续出现与发展,<sup>[8]</sup> 开始在另一个层面上开辟道路, 思想与学术的格局也随之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学科的出现, 既可视之为是“论题法”所取得的一种胜利, 同时也将对“理论化”、模式化的重视置于新的知识范型构造的核心位置。正如上述, “理论”虽然在某些学科中有时是相对“暗含”的, 但在有些学科中却一直以来是带有强大构造性的, 并且, 从总的趋势来看, 愈至后来, 愈益突显至前景。相较于“哲学”, 理论与之可以分享的一个共同点, 便是都属于一种世间化的思维并保留着某种抽象性 (直呈的或暗含的) 等, 但是, 却逐渐地放弃了对“本体论”这一终极目标的追逐, 而冀望于在一个更为往下的区域内, 即在分化出的专业界域内设立一套学科自身的“理想—典型”模式。借助于这个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演化路径的出现, 在“至上之物”或所谓的“逻各斯”被逐渐放逐之后, “学术”, 或“科学”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在四分五裂的、也是各个不同的知识分域或学科范畴内展开的, 正如李凯尔特在评价韦伯时所说的: “他也只愿意做方

[5] 甚至于在结构主义阶段, 像格雷马斯、阿尔都塞等仍将这一理论模式称为是“科学的”的。见格雷马斯《符号学与社会科学》,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 页; 阿尔都塞《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载《哲学与政治》, 陈越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6] 此也可见李凯尔特《韦伯及其科学观》中所述: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或许恰恰如此——欣然赞同韦伯对科学的观点, 即科学是一种纯粹的 (即免于任何‘先知语言’)、严格按概念运转的理论。”载《科学作为天职》, 第 96 页。

[7] “intellectual History”这一词语, 在此我们依据韦伯、福柯等的理解, 看做是“以知识为职业的人的历史”, 包括从事思想、宗教、学术等工作的所有人。

[8] 如从时间的维度上看, 除了少数几个学科如经济学、美学等之外, 在 18 世纪中叶即已初具雏形, 其他的大多数现代学科或理论, 如语言学 (理论)、社会学 (理论)、心理学 (理论)、宗教学 (理论)、人类学 (理论)、文学理论等都是在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陆续创建的。在中国, 受及西方的影响, “科学”的观念大致要到 20 世纪初才正式成为知识界所崇奉者, 关于“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出现, 可参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 《中国科技史料》1981 年 3 期。而“宗教”本身除了其自身的实践脉络之外, 也被收容到了“科学”的语域中, 并大致经历了相同的历程, 即先是转化为“宗教哲学”, 然后变成了“宗教理论”与“宗教学”。

方法论上自觉清明的专业研究者，从未想过像‘哲学’那样从事社会学。”<sup>[9]</sup>在此，如借用“巴比伦塔的倒塌”这一传说来比喻之，那么，我们所见到的便是在一种统摄性的霸权被推倒之后，四散于知识阔野上的是多种多样各自为政并急速繁殖的分支学科，由此，我们步入了一个以“科学”的名义为标榜的学科化的时代，以至于从智力劳动的方式或职业上看，“在今天，一项最终确定的杰出成就无不属于专业性的成就”，“科学已经踏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业化阶段”，<sup>[10]</sup>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一个以“理论”为导向的时代的强势登场。

采用这样一种归约法，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也可以看出，以上的概述仍然是十分笼统的，难免不落入化约论的嫌疑，如果从更为细密的思维上来探究之，不仅上述概括，而且几乎所有对“范型”或“范式”的描述，都必然是简约化的、不完整的。真实的情况应当是，无论是从神学到哲学，还是从哲学到科学或理论，都不是完全以“吃掉谁”的方式直线演进的，其间仍会存在着多重叠合、交错，甚至于回渗等，显现出边界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很多情形下，我们还不能将这种界分绝对化。

与之相关，诚如所知，即便是理论思维开始步入正轨、成功上位之时，哲学也依然保持着其向前滑动的惯力，比如到20世纪上半叶，甚至于50年代，像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出版于1927年）、萨特（《存在与虚无》出版于1941年）等的哲学依然十分流行，但是，几乎在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之后，似乎很难以发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准化”的哲学家样板了，尽管同期或稍后还有其他的哲学家出现，但也已近强弩之末，不再充任未来学术思潮的引领者。从大的整体背景上看，哲学已经失去昔日的荣耀，逐渐让位于理论，理论以替位的方式成了历史进程中的主角。

这个替位，既发生在哲学的外部，比如上面已举例的各学科理论的发展，也发生在哲学的内部。关于后者，也有不少的具例，比较典型的便有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如果就我们对哲学与理论的分辨看，德里达大致可以算是一个中间性人物。使用“中间性”这个概念，是因为德里达的学说既带有哲学所具的高度抽象性、思辨性，甚至整体性等品质，即仍然备有哲学的“姿态”，同时又对“本体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试图从根柢上去清算“逻各斯”对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最后，也是基于他的这种反叛性，我们一般都会将解构主义称为“解构理论”，而不是称之为“解构哲学”。其实像差不多同时的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德勒兹等，也都会带有这种混合性，即一面是表现出哲学家的某种样态，另一方面则又通过去哲学化、去本体，依据理论的模式来演绎自己的学说。稍后的人物还有如郎西埃、布朗肖、齐泽克等等，似乎也可划入这一模式中。

在欧洲，大约到20世纪50年代，理论对哲学的这种冲撞、冲击，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地步。德里达自己在《书写与差异》一书的中文版“访谈代序”中就曾回忆过当时的氛围，下面我摘录一段他的原话：

当时人们谈得最多的是哲学的局限，有时甚至是哲学的“终结”或“死亡”。就我个人而言，那时我虽然对于形而上学的关闭充满兴趣，但我从不赞成哲学已经完结的说法，因此我尝试在关闭与终结之间寻找某种道路。<sup>[11]</sup>

用通俗的表述来说就是，那时人人都已经在谈论哲学的终结，但我感到它还是有些用处的，不

[9] 李凯尔特：《韦伯及其科学观》，载《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87页。

[10] 《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第12页。

[11]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访谈代序”，第2-3页。

必完全放弃它,譬如也可以在哲学与理论或其他之间找到一条融合之路。撇开德里达而言,那么当时大的学术“氛围”是什么,人人在眼下最感兴趣的学问是什么?在法国的语境中,就是结构主义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看,结构主义就是在哲学已经疲惫不堪之时,给予其最后一击的那记重拳,并同时将对理论的信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位与众望所归的祭坛。<sup>[12]</sup>

让我们再回到“理论”的问题。首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从最为典型的表达样式来看,理论究竟是什么?为节省篇幅,在此我们仅举两列最具代表性人物的说法,其一,便是韦伯概括出的“理想—典型”(ideal-type),它被看作是将混杂、分散等的现象组合在一个自身一致、没有冲突的理解框架中去的“理想图式”(ideal-picture);<sup>[13]</sup>其二,是米尔斯在讨论“宏大理论”时提及的具有内部规定性的“类型体系”(typologies)、“句法特征”(syntactic feature)、“规范性结构”(normative structure)等。<sup>[14]</sup>在这两位学者的眼中,理论均属对世界事物的概念化抽象,当然不是抽象到本体论之上,而是对社会、人性、文化等经验事物的区域化、类分化抽象,从而将之视为一种均势化与理想化的知识解释模型。此中,我们似也可隐约地看到哲学所投射出的深度阴影,<sup>[15]</sup>即自觉地将自身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与因果必然律之上,这也包括认为真理不仅是可通过一套缜密的程序抽取、提炼出来的,而且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范畴、逻辑等是与世界的秩序大体对应的,并可在体系化之后进行相互认读的;特殊性虽然值得重视,但终究是可为普遍性的框架所涵摄的;甚至于那些“未知之域”,如欲望、心理、无意识、宗教神秘主义等,以及各种“剩余物”(remainders)如沉默、空白等,均可以被我们的理性分析之光照亮,纳入到学术理性的掌控之下。因此,尽管不是全部,但在大多数学者看来,通过一套系统化设定的“元语言”,并在“规则化”(normalization)与“程式化”(convention)的引导下,便可知解各分域内的几乎所有现象,从而达到“为自然立法”的目的。以此而言,它也与哲学一样,是雄心勃勃、自信满满、发号施令的,而学科从业者,尤其是那些学术达人也便被看作是类同于神职人员一般的先知,具有可敬与崇高的地位,并且不需要依附于什么外部的力量,而径直宣布自己便持有“独立之精神”。

除了原有的各种分支学科理论以外,约20世纪中期始,另外一种被称为“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也称为是high theory)的学术形态也在迅速崛起之中。<sup>[16]</sup>它也曾尝试对理论的定义做出适当的调整,<sup>[17]</sup>并在一个阶段中逐渐演变为知识大众的一种业内“行话”,在此,我将之称为是“理

[12] 对此,德里达也有解说:“当时,更经常地以追求非哲学或超哲学的方式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想正凯旋高歌,它宣布哲学已经终结,或者至少是哲学姿态不再是一种必要的姿态。列维—斯特劳斯就是这种情况,他受的是哲学训练,但他不想做哲学家。福柯亦是如此。他们都怀疑哲学,也都质疑人道主义遗产。”《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第3页。

[13] Max Weber on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90.

[14] C. Wright Mills,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First published, 1959, pp.33,34,37.

[15] 当然也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哲学,如阿尔都塞在《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一文中所述:“仅就基本要素而言,理论的领域包括了整个的科学和整个的哲学。因而,哲学本身就是它所干预的形势的一部分:它存在于整个形势内部,存在于‘整体’内部。”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46页。

[16] 关于“文化理论”的详细论述,见: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Penguin Books Ltd, 2003.

[17] 这一定义理论的新试验,最具代表性地体现在阿尔都塞与卡勒的言述中。阿尔都塞将理论划分成三个层次(即一般甲,一般乙,一般丙),既对原有的概念有所承继,也有所细化与突破。参《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5—186页。卡勒的定义与此前的说法均不太一样,突出了“跨学科性”、“反思性”(reflexive)与批判性等的意涵,大体上可看做是对文化理论所做的一种专门性概括,同时也对阿尔都塞立为法理的“一般丙”形成了解构。参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15。其他还有希利斯·米勒等也对之有述,在此不赘。

论的第二期”。与早期理论相比较，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后来出现的文化理论已不再局限于学科的分域内设立规矩，而是试图有所跨越学科的分畛，以“文化”为一大的论域去重建一种更具综合性与边界模糊的知识理解形态，以故也曾被斯金纳称为是“宏大理论的回归”（尽管是有限的回归）。<sup>[18]</sup>此外，它也对早期在学科建制中所自诩的“中立性”、“独立性”持有强烈的质疑，并将业已进行分区的“学术”与“政治”（如韦伯）再次粘连在一起，进而对前期理论中包含的“科学”与“真理”信仰做了釜底抽薪式的消解。借之，我们似已看到一种向“后学术”或“后学科”转换的机轴。当然，这并不等于其已解除了与前期理论的连带关系，而是既往如故地滞留在一种抽象化、普遍化言说的水准上，因此，大致可将之视为是理论的一次再进发。

对理论的质疑虽然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始点，但就一般而言，则显示为愈至后期愈趋炽盛之势，并且来自于多个不同的方向。有来自于“后现代理论”的，如利奥塔声称的“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毁灭理论”，这当然也是与其一套理论上的阐释相伴随的；有来自于激进女性主义的，在她们看来，“理论”这个词语以蛮横的方式对男性智力作出肯定，而其实“不过是一群年轻幼稚、情感受阻的男人，在比较他们自己的多音节的长度而已”；<sup>[19]</sup>也有来自于“反理论”学派的，在美国，像理查德·罗蒂、斯坦利·费希均被看作属于这一系脉，虽然他们自己也在从事理论家的工作，并在方法论运用上又更像带有一种哲学家的做派，但却认为既然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通过理论去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正确，因此，理论的有效性便是可疑的。<sup>[20]</sup>这有点像是德里达，一方面以为我们根本无法指望有任何确定的词语，并展开了对旧哲学与旧理论的全面消解，但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洞见提升为普遍化的原则。<sup>[21]</sup>尤其是在其追随者那里，对理论的言述看起来像是已演变为了一种“学术操练”式的“思维游戏”。<sup>[22]</sup>在此，我们也在那些仍然从事理论的学者身上，见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对待理论的反讽式姿态。<sup>[23]</sup>

在我看来，对理论的最为重要的冲击仍与以下二种思路有关。一是仍然出自理论的内部。除了解构主义之外，这里的“理论”，我主要指的是在此之前的结构主义。在经历了后知识时代的洗礼之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也许会对结构主义可以有一个更为中允的认识。它不仅将一种规范化的理论模式的演绎推进到了极致，即不仅将结构内的诸要素高度定型化，而且在学科上完成了对之的全覆盖化，因而已经超越了局部化理论的范畴，可准确地将之称为“理论一般”（theory in general）。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在内部对理论模式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看来，所有的结构模式不单具有稳定性，而且也是在过往的文化中“编排”（arrangement）出来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例证便是列维－斯特劳斯对图腾、野性思维等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借助于提出“图腾现象是怎样被编排的”——这样一个问题，置换了传统的“图腾是什么”的问题。<sup>[24]</sup>而文化

[18] 斯金纳对“宏大理论”的解释，包含的范围并完全不限于“文化理论”，也列入了如伽达默尔、库恩与罗尔斯几人。Quentin Skinner,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Human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2-13. 当然，这种“宏大”也不是回到黑格尔、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中，如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是“问题群”（problematics），福柯提出的是话语（discourse）知识群（epistemes），等。

[19]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p54.

[20]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pp54-63.

[21] Quentin Skinner,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Human Science*, p8.

[22] 参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A. Treichler(eds.),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274.

[23] 这种反讽性也被后来的一些学者指出过，可参 Quentin Skinner,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Human Science*, p12-13.

[24] 可参斯图亚特·霍尔对之的分析，Stuart Hall, “The hinterland of Science: Ideology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n Ideology*, by CCCS, London: Hutchinson, 1978, p25.

与自然的分野,也就出现在这一问题地带中,这是指所有的文化系统,都不是与自然平行的,而是通过“编排”而成为某种特殊的结构、不同谱系的。不同的编排由此而导致不同的文化形态,比如这个种族文化不同于那个种族文化,中国早期文化不同于埃及早期文化等等,都不是在本质(nature,自然属性上)上从一开始就规定好的,而是在被逐渐地编排出来了,因此,它是一种“约定”,而不是一种“本质”(自然)。如果沿着这个逻辑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话,我们差不多就到达了建构主义边缘。我们知道,建构主义是后知识区别于现代性知识的主要标志。从编排或“编码”(encoding)的角度看,也是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那么,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与理论体系也都是编排与建构的产物,不是与真理,同样也不会与自然本身——对应或对称的。说到底了,学者们曾经坚信不疑地试图展示的那些“真理”,也“如同意义本身一样,是我们使用文化工具来赋形与命名各种纷杂无形经验的一个产物”,<sup>[25]</sup>属于特定状况中制作(work)出来的一种产品而已。而一旦走到这一步,理论的普遍性、真实性、命定性的神话(同时也是科学主义的神话)就被从立论的根基上拆解了。从思想的连贯线上看,无论是福柯的“话语”构造论(如“性”观念的构造<sup>[26]</sup>),还是德里达对书写中介物(intermediary, supplementary mediations)的论述,<sup>[27]</sup>其实都源自于结构主义所给予的这一神启,而非完全出于自创。当然,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处理这一问题的切入点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总起来看,德里达的解构法是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的,而结构主义的“编排”则是在空间要素组合的维度上展现的。此外,两者的区别还在于,结构主义依然还是要回到对这个编排出来的秩序的发现与再建构上,而解构主义则试图通过引入中断、悖谬、沉默、空隙等鉴别方式对结构主义崇尚的秩序进行拆分,由此也必然造致“模式”的进一步失效。后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言人斯图亚特·霍尔所主张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对两者都有承继,一方面承诺时间性延宕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借助对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发展,试图在解构之外给机遇性、语境性的“聚合”保留下必要的位置。从后期学术展开的景观上看,像新文化史、后文化人类学(“写文化”)等都是沿着这条路径前行的。

对理论的规范化模式产生的冲击也来自于外部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语境论的思想,自然也可追溯至19世纪的历史主义传统或马克思处。<sup>[28]</sup>在20世纪的哲学、阐释学如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甚至德里达等的著述中也有所阐发,似乎并不让人陌生,但由于后期的这些见解一般都囿于语言学与文本主义的范畴,未能引向更大范围的学科领域,加之理论抽象主义的强势居位,因此使得其并未受到广泛的重视,竖立为主流学术所标榜的重要命题。

这样一种局面,要到文化研究等思潮兴起之后,才得以真正的改观,并渐次将语境论的思想演绎为一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治学理念。概而言之,并分疏地看,后来的语境主义大致包含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历史的语境,另一是指实践的语境。“历史的语境”,主要是就一般性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而言的,即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所有事件都是被各种来自于多个方向的力量造就的,置身于多重关系的博弈之中,这些多重关系编织成了一种临时性“集结”的状态或“情势”(conjuncture),这

[25] Dani Cavallaro,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General Introduction”, The Athlone Press, 2001, xiii.

[26] 具体地可见福柯的《性经验史》,余碧平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对之的一个分析也可参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p5-6.

[27] 参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208-236.

[28]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着重强调的还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与后来文化研究的特定“情境”(conjuncture)说还是有区别的,后者更偏向于关注“情境”内部诸要素之间的配置关系,将之看作一种更细化的、并为多重接合所造就与规定的“场域”。

也就是所谓的“语境”。<sup>[29]</sup>既然语境都是一次性的，不同的事件在空间与时间上无法完全重复，那么，也难以用模式化的方式套用之，解释之，而是更应当深入到对这个聚结状态的严密分析中。“实践的语境”，虽然也与历史的语境有关，但更多地是在当下与未来的维度上而言的，或说是在“介入”或语用学的意义上而言的，以此而论，便没有一种预先设定的完整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当下或后发的实践，这也是因为所有的介入性实践不仅是错综复杂的，而且也是可塑的，即处在不断被创造性地改变与构建之中，因此，重要的从来都不是预先提供的理论答案。关于这点，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有一很经典的说法，即：“我从来不相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只相信‘有用’的理论。”<sup>[30]</sup>而当某种理论一旦被带入到介入式的语境或使用之中，它也自然会被拆解，或做重新配置与组合等等。理论固然仍然是一种有用的资源，但它不是本质论或普遍论的，而是在工具论或策略论意义上才是相对有效的。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语境主义的一个思想要旨，就是语境的意义大于理论，也优于话语，因此在二者对话中，可以想见，后者必然会被排斥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这当然会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的重新确立产生重大的影响。

至此，我们大致已经能够窥知理论的整个降解过程是怎样形成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尽管仍有学者试图去维持“理论的胜利”这样的幻觉，<sup>[31]</sup>但90年代之后，形势又发生了一个预期之外的翻转，出现了各种“理论之后”等的表述。1996年由一些学者发起了一场有关当前理论危机的会议，并在会后推出了一本名为“后理论：文化批评的新方向”(Post-Theory: New direction in Criticism)的论集，虽然这一标题中的“后理论”概念指称的还是解构主义的后续系脉，并未真正超出“理论”之外，但却在其中反映出了学者对理论降解的忡忡忧心，如在由Martin McQuillan等撰写的“绪论”中，撰者即在篇首单独用了两组重复的排列句“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ory has been reported dead”、“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reporting the death of Theory has been reported dead”，突出强调了理论在当前遭遇的紧迫险情。<sup>[32]</sup>随着讨论进程的展开，2001年由Valentine Cunningham出版了《理论之后的阅读》(Reading After Theory)一书。<sup>[33]</sup>随后，伊格尔顿于2003年又推出了重磅式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不仅明确地承认理论已面临的危机状况，而且对其后的时代进行了描述与评论。此后，与该话题紧密相关并以“after theory”为标目的著述续有其作，代表性的如有Michael Payne, John Schad编撰的《理论之后的生活》(Life after Theory)、<sup>[34]</sup>Nicholas Birns撰写的《理论之后的理论》(Theory after Theory)，<sup>[35]</sup>等，均对这一已经发生的重大转换做出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反应。

从伊格尔顿一书的论述看，其所关注的还是特定意义上的“理论”，即第二期的文化理论，并非所有理论（似乎已毋庸提及），因此而将这一时段确定为是60年代到80年代，例举的理论家有拉康、

[29] 可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庄鹏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30]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12期，第48页。

[31] 此可见希利斯·米勒1986年在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主席时所做的演讲《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载《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50页。

[32] Martin McQuillan et al(eds.),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 in Critic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xxv.

[33] Valentine Cunningham, *Reading After Theory*, Blackwell, 2001.

[34] Michael Payne, John Schad, *Life after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2004.

[35] Nicholas Birns, *The theory after theor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From 1950 to Early 21 century*, Canada: Broadview Press, 2011.

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雷蒙·威廉斯、露丝·伊利格瑞、布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西克苏、詹姆逊、萨义德等，<sup>[36]</sup>后来又将在英国“占据这一位置几十年”的斯图亚特·霍尔的前期思想也括入在内。<sup>[37]</sup>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之间的一些相同点，不仅是以高度的思辨力而著称，而且也展现出了所谓的“高级理论”(high theory)的全部特征。在此设定下，理论之后的时代既被伊格尔顿视为是经验主义与感受性迅速繁殖的时期，也表现出了从高级理论向“低级知识”迁徙的显明的趋势。但是伊格尔顿的表述中也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即其对理论降解进行描述的着力点，并非集中在构造性“范式”或“模式”的变迁，而是转而更多地偏向于对“主题”(内容)的论述，以为在高雅的“文化理论”跌下神坛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性的“文化研究”，即从语言“革命”转换为了日常生活化的“愉悦”等等，虽然，此也属于“理论之后”的一种表现，但就“理论”讨论的范畴上看，还不是十分切题，更何况其对后期学术主题的概述也过于偏窄，对理论之后各学科领域发展的概括极为有限。因这些不在本文正式讨论的范围之内，便提到即止。

## 二、“文论”：地域化进展与泛文论

在西方，各个学科的发展虽然有前有后，但从总体的趋势来看，则与上述这一大的演化轨迹是基本吻合的。就文论，或文学理论这一特定的领域而言，在19世纪，主要盛行的便是文学批评与美学评论。虽然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文学批评也有多种释义，但从文类定性上看，并相对于“理论”而言，当属是一种更为随感性的书写模式，哪个时代都有，可暂且不论。而美学，如我们所知，在早期主要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有时也称为“艺术哲学”，因此都务须先解决“美的本体”问题，然后再下贯到对一些范畴、种类、功用等的解释，在此也不宜展开论述。但无论如何，在20世纪之前，我们的确很难见到那种可以被界定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即狭义的文学理论。在整个18—19世纪，用以直接应对各种起伏多变的文学动向的，主要还是各式各样的“批评”，在多数情况下又是以一些“易逝的碎片”构成的，如诗集或文集的序言、日记、书信、书评、演讲稿、散文、报刊小文等，成书的著述固然不多。直至20世纪，由于受到语言学，尤其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即有了一个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之后，才呈现出了一些成体系、成规模与规范化的文论。有鉴于此，许多学者都在著述中有过提及，譬如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的序言中，即将这“文学理论”出现的起点划定在1917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其俄国形式主义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作为手段的艺术》之时，<sup>[38]</sup>较早的还有瑞恰兹的实践批评等，而最为著名的当属英美新批评与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以及随后被归入在各种文论通论(教材)中的如原型理论、解释学文论、现象学文论等，由此构成了20世纪文论的一个庞大系谱。但此中出现的一个奇特现象是，

[36]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p1. 这批名单基本上与卡勒在 *literary theory* 中列出的人名几乎相似，只有多寡之别。见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 2. 以此可知二书标示的“theory”所指称的含义大体相近，均是指50年代之后的“文化理论”。希利斯·米勒列出的“理论”名单，除了来源性的索绪尔，也基本上是文化理论与解构主义中的人物，参《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载《重申解构主义》，第240页。

[37] 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最初列出的一长串“文化理论家”中，但在后文，伊格尔顿则补充提到他，并以为：“……在英国，像斯图亚特·霍尔这样的著名文化理论家，在果断地转向非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前，占据这一位置几十年。”参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p40. 由此可知，其是将霍尔的思想历程分为两个段落来处理的，这不仅是因为霍尔的后期思想更偏向于对“理论”的消解及提出重要的“情境”说，也在于在伊格尔顿看来，霍尔更像是“理论之后”这一新时期的代表，因此而未将之全然归入“文化理论家”之列，此当符合实际，并与伊格尔顿的逻辑推演保持一致。

[38] 参中译本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第5页。

除了个别特例以外（如利维斯的细绎派），我们几乎很难找到一种从文学自身内部发展出来的完全“独立”的文学理论，相反，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外部的其他学科理论中延拓出来的，因此也难免不带有对其他学科理论的某种依附性。<sup>[39]</sup>

当然，至少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在文学研究中，“理论”“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在前期，更为流行的还是以“批评”的名义称谓的各种流脉，如实践批评、道德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历史批评，甚至于新批评、原型批评等的概念，大体上仍然延续了 19 世纪的惯用提法。关于术语的运用与转变，詹姆斯·安格尔（James Engell）也曾有一个回顾，据其所述：

英美批评的大致改变是 20 世纪 30 年代，艾略特能够明确地称德莱顿为理论家，并且提到德莱顿的“理论化”倾向。……考虑到英国批评日益增长的理论倾向开始于韦勒克和沃伦 1949 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德莱顿现在似乎不像以前那样具有理论性了。<sup>[40]</sup>

这一说法提供了 20 世纪前几十年思想变动的若干信息，也就是在 30 年代，随着理论化倾向的展开，艾略特已经开始使用“理论”这个术语，尽管这个“理论”的含义既不标准也缺乏体系性，似更多地还属批评中蕴含的一些理论要素。但也正是在这种趋势主导下，以及受到其他外部理论发展的推动，直到 40 年代末，才由韦勒克、沃伦在其所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中，将开始流行的“理论”一语清晰地标示在著作的眉首，只是它已不再滞留于对理论“要素”的评估，而是明确指称一种更具模式化，也带有更强规定性的理论（体系）。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韦勒克也首次正式地提出了文学研究的“三分法”，从而有了对所谓的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明确判分。韦勒克也是新批评派的主要代言人之一，或许正是基于新批评本身所创造的业绩，以及对过去那种随感性较强的论述方式的排斥，而朝向于一种更为细密化、统序化的逻辑演绎，因此而有必要在过去的“批评”概念中再分化出另外一套命题类型，<sup>[41]</sup>以进一步凸显理论在这一总的文学研究系统中的位置，这自然也是时代所发出的一种召唤。韦勒克当然也研究过之前的文学思想，但却并未将之称为文学理论，而是仍将他的那本煌煌大作命名为“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我想，这大致也是因为其考虑到以前的那些本文还不太合乎其所定义的“理论”标准，因此，需要按照惯例将理论出现之前的有关文学的表述统称为“批评”。而正如我们所见，在此后，以“文学理论”命名其著者渐次增多，尤其是进入到 70、80 年代之后。

与之同时，也是在韦勒克等的影响下，在 70 年代美国汉学界出现了第一本研究中国文论的系统性著作，这就是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其后，又陆续形成了研究中国文论的一个小高潮。其中，广为中国学者所知的就有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该书虽然未以“理论”命题，但却很明显地是按照理论的思路来选辑与论述各种批评文本的（中译本遂也径直将该书的书名译为“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sup>[42]</sup>），将各种散漫的批评史料收编在其理论性描述的框架中。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这两本书出现的时间点，借之可

[39] 关于这点，可参伊格尔顿与卡勒的论述。伊格尔顿的论述，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二版序言，第 3 页。卡勒的论述见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3.

[40] James Engell, *Forming the Critical Mind: Dryden to Cole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2.

[41] 对此两个概念，韦勒克也有一个界定，即以为：“似乎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文学批评’或看成‘文学史’。”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31 页。

[42] 见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以看出,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研究,也正好是尾随西方文论,进而是西方理论地位的提升而抵达的,与大的语境展开是相步趋的。

然而,在此之后,随着解构主义,尤其是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新文化史等后学术的崛起,西方文论的画面又随之一变,建构主义与语境主义等开始掠城拔寨,一路高歌,作为规范化的理论模式则只能处于守势状态,并节节败退,至少已经不再作为学者们的主要工作目标。而作为海外汉学中国文论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论著作,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于1993年出版的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也成了文论世界中最后一曲“天鹅的绝唱”。约从90年开始,英美汉学中的中国文论研究都已改换门面,旧的,以“文论”为名义或为实质的研究,几乎已经无人问津,甚至于貌似带有文论化样态的一本专著即1993年由苏源熙所撰的《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也已明显表现出对宇文所安等解释的不满,始而着手对《毛诗序》等的“文论”定义做刨根究底的解构。<sup>[43]</sup>

言及于此,也需要回顾一下中国文论的成长与演变经历。从文化多元论的角度看,虽然自现代以来,我们一直倾向于用西方的概念范畴来梳理中国的知识学传统,但毕竟后者还是有其特殊性的,譬如关于中国传统中有没有“哲学”或“美学”这样的议题,多年来就存在着争论与不同的意见。当然,因为我们目前涉及的主要是“文论”的问题,因此需要及时回归正题。

在这个话题范围内,首先我们会遇到的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相对规范化、模式化的“理论”,或确切地说,有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文学理论”?我认为还是有一点的,比如像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清代叶燮的《原诗》,差不多可以归入到理论的范畴之中。然而,这两个文本的情况又是很特殊的,尽管在进入“文论的时代”之后,学者们往往倾向于将这两个文本的地位抬得很高,比如像高友工、叶嘉莹等均对《文心雕龙》这种宏大的思辨模式称颂不已,但同时又认为这样一种逻辑化的演绎模式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极为匮乏的。<sup>[44]</sup>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所发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几乎没有影响到后来展开的各种流派与创作。这至少可以说明,在传统的语境中,“理论化”的模式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学感知与批评方式是甚不相容的。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传统的对文学进行审视的方式是那种更为零散化、感知化、随机化的批评方式。批评中也带有思辨,并会使用一些概念,但与以规整化方式构造的理论模型又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正因若是,在早期,对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各种言述所做的最为高度的概括,便是明清以来发明的“诗文评”这一术语。进入现代之后(也就是在“五四”以后),由于受到西方学术理念的启发,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学思想的梳理,所使用的核心概念仍然是“批评”这一术语。这可以从民国时期几部最为重要的相关著作的标题中获取明证,目前我们所见的首部同类著作便是陈钟凡所著的《中

[43] 参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卞东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在本书中,作者所使用的这种解构策略是将《毛诗》与《诗序》置于当时的使用与注释语境中看待,以为《诗经》在早期的叙述历史,属于礼这种先导性模式的副产品,也是超阅读的,而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也并未被视为文学材料,而是被注释家们当做经学文本看待的,等等。第163-167页。按此推论,那么也只是在后来有了“文学”的概念以及“文论”的概念时,我们才以一种新的预设将之置于自己所希望看到的范畴中。

[44] 如高友工所论:“……确切而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讽刺的是,也是最后一部作品。”载Yu-Kung Kuo, “Chinese Lyric Aesthetic”, Murck, Alfreda and Wen C. Fong(eds.),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4. 叶嘉莹之论见于其《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除了一部《文心雕龙》略具规模纲领之外,自刘氏以后一千多年以来,也竟没有一部更像样的具有理论体系的专门著作出现。”其他都属“体例驳杂”之作。《迦陵文集》(2),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国文学批评史》，著者也在书中做了解释，以为使“批评”的术语来自于西方。<sup>[45]</sup> 其后的所谓三大家，即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的著作也不约而同地是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书题的，其他稍重要一些的学者还有方孝岳、傅庚生等的著作无不如此。这些都至少表明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界尚未接受一个“文学理论”或“文论”的概念。

其间也出现了若干变化，最初可能发生在40年代罗根泽所著的批评史著作中，对理论要素的强调有所展露，比如其在“文学批评界定”一节中提到：“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a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sup>[46]</sup> 由此，罗根泽以为在批评之后或之上，其实蕴含着有一套更深的理论系统，以故需要提升对“批评理论”或“文学理论”的认知，此中也似已包含有与韦勒克“三分法”相同的意见。此后，也是在50年代之后，对“理论”的重视经历了一不断攀升的历程，并伴随着“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二概念的交替使用，大体上是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论”或“文学理论”的概念才在中国学术界正式占据上风，成为学者们较为广泛使用的一个学科用语，<sup>[47]</sup> 而“批评史”的概念则被弃之边缘，各种以“中国文论史”（古代）标榜的著作或论文大量涌现，对原来处于“诗文评”与“批评史”状态下的各种言述史料施行了全面的收编，并将之纳入到新的解释框架中，由此而最终完成了文学概念史与思维史上的一次成功转型与变容。80年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洞开与西方20世纪文论的大量引入，中国学界也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理论热”（早期还有一与之平行的“美学热”），直至当今仍声浪未歇，余波荡漾，这不仅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理论”与“文论”这一概念范式的认知，也曾在一个时期中激发了一些中国学人构建体系的种种冲动。

然而至转入新世纪之后，一些新的景况也在不断酝酿之中。据一些观察可知，学界对规范化理论的崇信已有所削减，理论发明的冲动也处于退潮状态。虽然在大学课程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开设有“文学理论”（或用其他名称如“文学概论”等）这一课程，但学界也对这一总体化的论述模式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对教程中普遍流行的“文学本质主义”叙述抱有深度的怀疑，从而希望将所谓的理论“原理”转化成理论“问题”。<sup>[48]</sup> 在此同时，新一代学者对自己研究课题的选择会更多地偏向于专题化的考量，以便能够更为充分地考虑到历史语境带来的各种限制。除此以外，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路径，像以文学思想史、文学观念史、文化诗学等命名的研究范型均试图避开本质论的缠绕，从而寻求其他更为具体化、多样化的研究出路，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研究气象。进而，也是尤值关注的一点，便是文化研究在新世纪初在中国的泊岸，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理论的看法，也引动了在话语模式及研究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为此而将中国的文论研究带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展面。<sup>[49]</sup>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西方文论升降的曲线大致如上所绘。如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加以比较，似乎也能在其中找到一些重叠与叉合，从大的进程上看，两者的履历似有趋同之处。这就是，先是出现

[45]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重印版，第5页。

[46]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7] 对此具体进程的描述可参黄卓越：《批评史、文论史及其他》，载《黄卓越思想史与批评学论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48] 参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49] 关于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造成的影响，在地域上当包括西方（或国际）与中国两大板块，具体的论述也可参黄卓越：《离合之旅：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考察》，载易晓明主编《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另可参黄卓越：《文化研究及其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83-86页。

了一对理论或文论模式的膜拜与热衷,这既是在哲学降解的过程中展露出来的,也可看作是对“批评”化形态的一种模式化提升。然后先是在西方,随后是在中国,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理论与文论降解的趋势。当然,区别也是有的,这就是在西方,反理论的意识是以十分明确的姿态表达出来的,甚至径直以“理论之死”、“理论的终结”这样一种无可商榷的口吻传递出对理论的失望,而中国学界尽管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对理论的警戒,但并未出现十分明显的危情意识或对之实施言语上的颠覆性攻伐,在更多的情况下,多还是借助一些具体的践行方式来显示出转轨的意识。分析其中原由,或与以下的事实有关,即理论在西方已成为一种过度化的演绎,以致也在某种程度上愈益演化成了一套自说自话的言语或技能游戏,甚至成为少数思维能人确认自己学术声誉的一个高冷坐标。然而在中国学界,除了少数情况之外,则一般还能对之保持一种相对节制的心态,对理论的兴趣虽然经久不衰,但并未由此形成某种傲视于学术群伦之上的玄学“清流”,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未将之与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截然分隔开来。当然,“理论”作为一个正式的、规范化的概念,本来就是一个西方化的用语,并与一套确定的思维方式是互为因果的,因而在中国的场域中观之,也属于一种植入性的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知识移植的烙印,这也使得移用者会对之怀有相对清晰一些的,同时也是距离化的意识。而如更全面地看,不同区域学术范型的演变,多少也会与本土自身的需求,以及区域内各种资源配置关系的消涨、变动等紧密相关,因此即便是对域外知识与思想的汲用,也多半不会完整地照搬,这也可以从当代中国学者的大量研究范例中得以证实。

如果套用 Michael Payne 与 Nicholas Birns 的言辞,那么,“理论之后的生活”,或“理论之后的理论”又会是怎样的呢?进而,我们也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即文论之后的文论又会是怎样的呢?

在此,我想首先提供一个分辨性的前提。无论是已经谈及的“理论的终结”,还是所谓的“理论死了”,反映出的主要还是人们对一种具有高度抽象化、整体化与模式化理论的质疑,其中也包括后来擅场的“文化理论”。后者尽管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却仍携有第一期理论所具的一些共同特征,并未跳出“理论”所属的范畴。与之同时,“理论之后”的提法,也是有所限定的,并不意味着进入到了一个“非理论”的时期,或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理论了,而是另有所指,即在以理论为王的时代谢幕之后,对理论的体系性构建不再成为学术追求的主要目标,或视之为智力工作者的崇高信条。如此再来看“降解”一词所包含的意义,主要指的还是理论在知识阶序坐标上的跌落,并非言其就消失不见,或可有可无的了。正如一些学者所主张的,理论已经到了应当放低其身段的时刻,以便进入到与“经验”的重新调协中去。<sup>[50]</sup>这些都表明了,理论尽管在大幅度地贬值,但仍然还会以其他的多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学术言述中。

就文论这一特定的领域而言,在这里,我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词来表示“文论之后”的一种学术状态,这就是“泛文化论”。泛文化论有几个层面上的意思,虽然未必一定会保持逻辑论证上的一贯性,但却可在理论降解之后的一些学术变化中将之梳理出来。

首先,是理论被广泛地吸纳到了经验性的研究之中,这与经验研究被吸纳到理论模式中去的旧有程序似乎正好对反。当然这不是指一种整体的吸纳,而是适用于语境的限制性吸纳,在此情形之下,某一理论不再被看作是对世界的一种恰到好处的对称性与无缝性“映现”,而是更偏向于将之视

[50] 这个看法,即主张理论与经验的协调,可参欧内斯托·拉克劳的一段表述:“What we have, instead, is a process of mutual contamin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empiria’,—the former having abandoned its aspiration to constitute a ‘superhard transcendality’ and the latter having lost the innocence associated with pure ‘data’.” Martin McQuillan et al(eds.), *Post-Theory: New direction in Criticism*, “Praface”.

为一种解析世界的“策略”或“工具”。<sup>[51]</sup>同理，也如我们大家目前已经比较充分地意识到的，既然世界总是多义与复杂的，对工具的使用也应当是灵活多样的。工具的这种灵活性，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一个木匠制作一件家具，他需要不断更换工具箱中储存的斧头、刨刀、凿子、锯子、螺刀、钳子、刮刀等等，这是由对象多变的形状与特征决定的，这个例子也同样适合于对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分析与研究。据此，单一化的整体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已失去其原有的独立自持性，只能在拆分开来时才是适用的。比如再举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有关 19 世纪女传教士旅行书写的项目，虽然从表面上看似可归入到后殖民的话题中去，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却不能拘于这个单一的视角，因为它会同时涉及种族、性别、阶级、文本、表征、审美、情感论、区域学等问题，既然如此，理论视角（工具或策略）的措用也必然是可变的或多变的。此外，在几乎所有的专题性、场域性研究中，还需要注意到大量的史实也会溢出现有的各种理论设定之外，甚至于带有某种“即兴”的特征，但它们也同样属于需要解释的一部分，由此也会使理论暂时地窒息在这些事实坚硬的客体之外。也正因此，我们需要看到模式化理论的先天局限性，在对之进行参照使用时，有必要重新协调它与各种分别化境遇的关系。理论在具体研究中的这种迫动性分解，我们也可将之看做是其朝向经验世界时所做出的一种主动性分解过程。

其次，在当代学术的发展中，学者们也逐渐发现，如果泛化地看，文论或理论并非一定要以模式化的、框架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只要是具有概念化深度的表述，譬如说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批评”，也均可看做是带有某种“理论色彩”的，因为在这些零散的、随感化的表象中也有可能潜藏着一些相对有序的思考线索，对之，并非定然要用“理论”的概念去统摄之，而是仍然可以允许其继续保留在“批评”的命题范畴中。此外，我们甚至还可能在对文学史作品或其他对象的研究中获取一些理论化的要素，其实，像过去的许多中国文学批评言述，也大多数是从对作品的阅读与分析中提取概念与思想的，这一经历对于我们今天也仍然是合用的，即从不同的文本语境中去发现或发明一些“微理论”，它们当然也是具有可比性与辐射性的，但却很难也无须将之提炼为一般性、整体性的模式。这种对微理论的提取以及对局部性规则的提炼或将在宏大理论破灭之后，成为新的理论发明的一条更为可行的路径，值得我们关注。

再次，从理论之后的各种研究中，我们也能见到一种颇为广泛的趋势，以及对之所做的学理性描述，即“文论”的概念已被做了十分泛化的理解。从某种角度看，这与语言学的展开以及建构主义的流行，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多种实践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一趋势的演化路径带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做更细致的梳理，从其效果来看，它一方面与“文学”边界的松懈与涣解有关，并造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审美主义的衰竭，但另一方面，又通过与“文学性”（literariness）的设定性勾连，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对人文社会学研究基础的重建。这主要表现在对诸如文本、书写、表征（representation）、表意（signification）、符码（symbol, code）、话语（discourse）、叙事、想象等概念的广泛使用中。这些概念（或与之相伴随的一组入思方式）看似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但似乎也可归入到文学研究的范畴中，同时又是文化理论、解构主义、文化研究、新文化史与新历史主义等所普遍运用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并可往下再衍生出更为繁多的次一级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暂时不计语言学的来路，那么这些理论性的概念就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的要素，与之相应，那些使用这些概念来组织思路的各种研究也会被归入到宽泛意义的、同时也是“貌似”的“文学理论”之中。这种事例在 90 年代之后的研究中可谓俯拾皆是，如詹姆斯·克利福德在为“后人类学”

[51] 关于理论作为“策略”或“资源”的提法，也可参格罗斯伯格的论述：“文化研究秉持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重塑了理论间的关系。……在文化研究中，理论和语境是相互构成、相互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对理论的‘去神秘化’，其目的就是将理论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因而，文化研究不能与任何单一的理论范式或惯例等同，且一直与各种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相论争……”《文化研究的未来》，第 25 页。

的经典性著作《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所撰的“导言”中，即提到“最近，‘文学的’方法在人文学科流行开来。在人类学领域，只提少数人的名字，颇有影响的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都对文学理论和实践有兴趣”，<sup>[52]</sup>由此而从“诗学”的角度出发，揭开了人类学“文化转向”一个重要解码策略。又如罗伊德·克雷梅(Lloyd Kramer)在《文学、批评及历史想象：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文学挑战》(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e)一文中，即梳理了上述两位历史学家与文学理论的亲缘关系，<sup>[53]</sup>而林·亨特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的“导论”中，在谈及自己主持的这项研究“议程”时，更将文学理论与人类学对当今社会学的影响作为聚焦的中心，以为目前新文化史研究首当其冲的要务便是迎接来自于这两个方面的挑战。<sup>[54]</sup>如上所述，既然新时代的人类学同样也是受之于“文学理论”所带来的启示，那么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也自然可以归为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再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杰出论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c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Nationalism)，其书名冠以的“想象”一语，也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常用术语。如此看来，也按照这些学者的推论，“文论”似乎至少已经渗透到了上述的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研究中。在此情形之下，也有学者干脆就将“理论”与“文学理论”直接地等同了起来，如在乔纳森·卡勒看来，“文学理论正在一个未被命名但常常被称为‘理论’的界域内，紧密地与富有活力地与其他写作联系在一起”，因而或可将之命名为一种“新文类”(new genre)，而我们也“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文学理论”。<sup>[55]</sup>与之相似，后来出版的Nicholas Birns的《理论之后的理论》一书，尽管标题中冠以的是“理论”这一术语，其实所讲述的也还是文学理论，同时，也可将之视为是对当代各种学科与思想流派进行概述的一个总名。<sup>[56]</sup>如此看来，貌似归属于文论(文学理论)的那些概念，事实上早在文化理论的时代就已经泛化到了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中，对各分科知识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并使“学科”的分界变得愈益模糊，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其他学科的作用又非直接施为的，而是借助于“文化研究”这一中介或津梁来实现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出现了一个“泛文论化”的趋势，应当是言之有据的。如果“文论”这一早先就已发明的概念或治学类型，还存在于我们的学术中，那么在当代，它更多地是以一种泛化的方式表呈出来的，不再限于狭义的学科，或可单纯归属于有关“文学”的文论。更为重要的是，诚如我已述的，在理论被解纽之后的研究中，它更多地会首先将自己置于各种具体多样的语境中，并与语境形成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

(责任编辑 张灵)

[52]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1-32页。

[53] 参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122页。

[54]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导论”，第1-21页。但默克罗比却以为：“文化研究被社会学家们错误地当成了文学理论的分支。”参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55]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1982, reprinted in 2007, p16.

[56] 有关于此，正如针对该书所撰的一篇书评所指出的(翻译如下)：“然而，这本书的标题带有离奇的误导。它既不是一本彻头彻尾的理论著作，尽管它将理论作为该书的唯一主题，也不是真正地瞩目于‘理论’之后的当代理论。该书的副标题为‘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文论思想史’，却是该书的更为重要一个聚焦点，其划出的界域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即将不同的学派和著者归入到了一个总括性的术语之中。”Ralf Haekel, “Looking back at Theory”,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 2013, 05.06.

YU Fengrui/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The Draft Amendment of Land Administration Law prescribes “tract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conditions for expropriating collective land. The beneficiaries of “tract development” are specific. Whether it is in line with the public welfare purpose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still needs to be judged.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judicial control function of public purpose of the expropriation decisions for tract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land system reform.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blem thinking” and “system thinking”. It’s a rational thinking rule which could promote the balance of power structure, reconcile public interests and private interest, and achieve substantive justice. The steps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re all based on a certain factual review, which could provid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judicial review of the purpose of public welfare in the case of tract development. The review steps in turn include the legitimacy of the purpose of the expropriation decision, the validity of the purpose of the expropriation decision, the necessity of achieving the purpose of the expropriation decision, and the proportionality between the purpose of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loss of private benefits.

### The Degradation of Theory and the Trend towards Generaliz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164

HUANG Zhuoyue/Ph.D of literature, supervisor of doctoral candidates, professor of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cademic leader of doctoral program in literature and art.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ory”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foundation of “discipline” in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n, it replaces philosophy to be a new academic paradigm that dominates the direction of knowledge exploration. This paper divides it into two major period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and they are the first phase of theory and the second phase of theory.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the “literary theory” as a branch, thinks it is after the regional theoretical degradation or “after the theory”, and appears a trend towards “pan literalism”, which generally manifesting in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scholarship.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above, the author hopes to regularly master a boarde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and enlighten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 On the Various Manifestation of the Beauty of Connotation 179

QI Zhixiang/ Ph.D of literature, supervisor of doctoral candidate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ident of Shanghai Aesthetics Institute.

**Abstract:** The beauty of connotation refers to the “inner beauty” of satisfying the mind. The reason why the external image is pleasant is that the image contains, attached to and symbolizes a special meaning. As object beauty that makes the centralized nerves happy, it includes beauty of morality and utility that embody goodness, beauty of noumenon and science, and also materialized beauty of emotion and meaning, beauty of imag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beauty of suspense of stories and beauty of connotation presented by beautiful appearance. This paper tries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for various forms of beauty of connotation with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and cases. It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to understand the beauty of connotation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in Mo Yan’s Works: From *Dry River* to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195

ZHANG Zhizhong/Professor, supervisor of doctoral candidates, College of Literature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mother image written by Mo Yan. The mothers in Mo Yan’s three works, *Dry River*, *Guilty and Joy* are lack of warmth or not strong enough to survive, the mother in *Red Sorghum* was self-highness but lack of maternity like Dai Fenglian and the mother, Shang Guanlu in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is praised to be great. These works have integrated hometown, childhood and mother into an organic whole, and achieved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Mo Yan’s personal creation, especially in novel creation. It also has made a thorough elaboration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 Yan’s creative process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for the great sorrow and empathy embodied in mother image.